

The Institutional Origin of
Japan's Management Model

日本式管理的制度起源

陈俊升 著

The Institutional Origin of
Japan's Management Model

日本式管理的制度起源

陈俊升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式管理的制度起源/陈俊升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3. 10

ISBN 978-7-214-11005-3

I. ①日… II. ①陈… III. ①企业管理制度—研究—日本 IV. ①F279.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53648 号

书 名 日本式管理的制度起源

著 者 陈俊升

责 任 编 辑 张 凉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http://jspph.taobao.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52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12.75 插页 1

字 数 165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214-11005-3

定 价 22.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 言 了解日本 增强竞争力

李嘉进

19 世纪,当欧洲与美洲列强不断向外拓展殖民地时,中国及日本都曾致力于进行现代化,以免沦落为列强的殖民地。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清朝战败,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清朝被迫开放上海、宁波、厦门、福州与广州等港口,放弃锁国政策。1853 年,美国远东舰队司令佩里率领军舰,挟着船坚炮利,要求德川幕府结束长达三百年的锁国政策,开放门户,进行贸易。

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策略,强调西洋列强“船坚炮利”的重要性。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开启了“自强运动”或“洋务运动”。但是,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清政府被迫割让台湾等地给日本,清王朝梦醒,方觉邻国日本已非昔日的“倭寇”,清朝不仅打不过“洋毛鬼子”,甚且连过去看不起的“倭寇”也打不赢。日本则先后打败了清朝与俄国,成为世界强国,让清朝统治下有志于政治改革的人认识到,要富国强兵绝非仅仅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及“船坚炮利”等军事科技,更重要的是政治制度的革新。以邻国日本的明治维新为鉴,他们体认到建立一个立宪民主政体对于富国强兵的重要性。光绪年间,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不仅鼓吹君主立宪,并

倡导传统儒学的价值,虽然戊戌变法失败,但也种下了后来辛亥革命成功的因子。

1868年,日本开启了近代第一次政治革命,史称“明治维新”。长州藩与萨摩藩组成“萨长联盟”,主张倒幕,在“鸟羽伏见”一役打败佐幕派,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及西乡隆盛等维新人士推翻德川幕府,推动废藩置县,大政奉还天皇。其后,阪垣退助等自由民权论者受到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鼓吹制宪。不久,日本政府于1885年实施内阁制,1889年正式颁布宪法,1890年召开第一次国会。明治维新的另一个目标是工业化。日本在幕府时代诸藩就开始发展重工业,譬如熊本藩的长崎造船厂,明治维新后则加速工业化,日本先后打败俄国与中国的清朝,最后成为世界强权国家,并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

二次大战后,日本进行战后的重建,20世纪80年代开始汽车等相关工业的竞争力,甚至开始超越美国的企业,并收购美国企业,而被视为是第二次的“偷袭珍珠港”,“日本第一”的称号不胫而走,日本式管理也一时蔚为风潮,成为欧美学者眼中的显学。

本书的内容即是探讨日本式管理的制度起源,以便了解日本的政治家与社会运动者在20世纪初期面对因为工业化而不断产生劳资冲突时,如何透过立法与公共政策的制定等制度设计来避免劳资冲突越演越烈,而使得日本的劳资关系能够和谐运作,最后使得企业的竞争力能够维系,经济发展能够持续,并使得国家富强的目标能够达成。

日本式的管理模式被归类为莱茵模式(Rhine model)。相较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Anglo-Saxon model)而言,莱茵模式重视公共利益,强调员工的参与,有别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重视短期利益及自由竞争。现今世界,这两种模式的竞争已经变成是“两种资本主义的战争”。隶属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美式企业是一种纯营利的经济体

(US company is an economic company),而属于莱茵模式的日本企业则是一种共同体(community)或者社群。日本式管理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秩序,也维系了一种伦理秩序,而具有社群主义的意涵。对于海峡两岸而言,日本式的管理都是一面镜子,能够提供我们另一种管理方式的思维与伦理关系,帮助我们了解日本,增加我们自身的竞争力。

2013年5月12日

序 言

日本作为儒教文化圈内的国家,社会结构却与中世纪欧洲的不少国家相似;在世界近代史上,作为一个后起国家,以很短的时间完成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经历绝对主义,又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二战后,在美军占领下实行民主改革,其发展具有很大的特殊性。研究这种特殊性,不仅有利于了解历史上的日本,也是了解目前和未来的日本所不可缺少的。

对于这种特殊性以及其发生原因,有过许多著述。现在,又增添了一部力作,这就是陈俊升先生所著《日本式管理的制度起源》。

这是一本独辟蹊径的著作。作者以日本的劳资关系为突破口,着力“厘清后进发展型国家在资本主义化过程中,针对此一过程衍生的劳资冲突进行何种论述,并通过这些论述如何在不同的典范之间据以进行制度的选择”,从而深入地揭示了当时日本劳资关系,以及政治精英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日本劳资关系所作的制度选择的特殊性。

战略学要求人们在做战略思考时,花大力气找出对全局具有重大影响的局部,把握了这些局部,才可能综观和把握全局。做学术研

究,也应有这种战略眼光,应善于选择与全局有密切联系的局部进行。作者是具有这种眼光的,他选择劳资关系是独辟蹊径的,但这蹊径不是导向绝地的羊肠道,而是与日本发展的特殊性这一广大天地密切相连的。如同作者所述“从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中叶,日本的政治精英一直面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及国家体系(“富国强兵”)的竞争压力,必须进行资本主义化。而在此一过程中,还必须维系劳资关系的稳定,稳定的劳资关系才能确保市场秩序不坠,以便进行资本积累。以“家长制”为核心的国家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及军国主义得以在同一个意识形态谱系上衍生出来,而对其制度起源的理解与解释无法忽略“家长制”论述如何在“大正民主”时期有限的多元体制中建构并取得正当性此一过程。“家长制”论述在日本政治精英进行制度选择的历程中,如何被运用。政治精英在劳资关系之制度选择的过程中如何通过“家长制”论述界定劳资双方的利益,并据此论证“家长制”合乎劳资双方的共同利益。这些利益由谁来界定,如何界定,议程由谁设定,由谁主导,背后隐藏了谁的利益,而何者的利益又是被这些议程所忽略,在议程的设定过程中隐而不显,都将是本论文试图去探究的问题。”

确定了研究方向后,作者选择了与自己的研究目的相适应的研究方法。

因为作者的研究目的是将制度选择及其行动放在既有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国家体系这两个体系的框架之内,去分析政治精英如何理解这两个体系的作用,并且以日本的政治精英在面临资本主义化与民族国家建立这两个挑战时,重新建构“家长制”此一制度选择为案例来论述分析,探讨日本政治精英如何论述此一制度选择具有其正当性,且足以解决双重的危机。因此,作者以论述分析来研究制度选择的政治决策;同时,试图整合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及经济学家等对于理念的作用所进行的探讨,以使论述具有更丰富的内涵。

因为劳资关系是权利义务关系,也是权力关系,为使政策制定及论述过程中权力关系的层次更为分明,作者通过权力层次的剖析来界定劳资关系正当性所可能产生的三个不同的权力面向及层次,并试图理解这些层次是否存在与其交互关系,通过此一过程来重新审视正当性的论述。

因为劳资关系的政策论述,系由政治精英作为行动者所进行,并发生在政策社群这一场域。因此,关于政策社群的可能运作模式以及概念界定,借用公共政策学者的理论来加以阐明。

在上述基础上,作者展开分析,得出了若干有新意的结论,不但对认识日本大正时期政治精英之论述对劳资关系建构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认识日本发展的特殊性也具有重要意义。

日本作为中国的近邻,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对中国都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这是一个我们必须下大力气研究的对象,期盼继续看到作者关于日本研究的成果问世。

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

上海交通大学环太平洋研究中心主任

王少普

2013年5月15日

目 录

第一章 导言 1

- 第一节 后进发展型国家的劳资关系 1
- 第二节 被迫的现代化 3
- 第三节 政治精英的“家长制”论述 3
- 第四节 为何重构“家长制” 5
- 第五节 为何选择大正民主时期作为研究范围 7

第二章 从亚细亚生产模式到两种资本主义 9

- 第一节 从亚细亚生产模式谈起 9
- 第二节 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 13
- 第三节 后进型资本主义 16
- 第四节 日式管理的制度起源 17

第三章 论述——建构制度的政治行动 20

- 第一节 论述分析 21
- 第二节 政治精英 35
- 第三节 家长制 36

第四章 劳资关系制度建构的思想脉络 39

- 第一节 启蒙与传统的纠葛 39
- 第二节 从自由民权走向国权之路 43
- 第三节 传统“家长制”的转化 46
- 第四节 专制传统的重构 48
- 第五节 社会主义运动 51
- 第六节 日本社会主义的儒家精神 54
- 第七节 民族国家的危机及转化 56

第五章 资本主义及劳动体制的建立 59

- 第一节 纺织工业——出稼型女工 77
- 第二节 造船工业——亲方请负制 81
- 第三节 矿业——纳屋制度 91

第六章 劳动组合运动及社会政策论 96

- 第一节 劳工运动的序幕 97
- 第二节 解决劳动问题的三种主张 99
- 第三节 劳资冲突论与劳资协调论 101
- 第四节 劳资冲突加剧 104
- 第五节 社会主义与社会改良主义 106
- 第六节 大正时代的劳工运动序幕——友爱会 110
- 第七节 友爱会的“劳资协调主义” 111
- 第八节 首次劳动祭——劳工运动的团结及分裂 112
- 第九节 工团主义 115
- 第十节 中央集权与自由联合 117
- 第十一节 “左旋回”及“右旋回” 118
- 第十二节 社会政策学会的复活 120

第七章 政治精英的论述与劳资关系的建构 128

- 第一节 现代官僚体系的建立 128
- 第二节 社会政策的官僚化 129
- 第三节 政策之窗 131
- 第四节 选举权的普及化 134
- 第五节 推动劳动立法 135
- 第六节 “家长制”的论述 140
- 第七节 劳资一体论的经营家族主义 147
- 第八节 劳动运动思想的防波堤 150
- 第九节 选举权的实相与虚相 153
- 第十节 选举权与家长制 159

第八章 家长制的功与罪 162

- 第一节 制度选择的兼容性与优越性 163
- 第二节 家长制与现代化 166
- 第三节 劳动政策的正当性 167
- 第四节 家长制的两面性 169
- 第五节 正当性的吊诡 170
- 第六节 共同利益的面向 172
- 第七节 优先性 175
- 第八节 公共政策的氛围 176

参考书目 179

致谢辞 193

第一章 导言

第一节 后进发展型国家的劳资关系

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历程当中,日本与中欧的德国以及东亚的中国一样,属于后进发展型国家,相较于英国、荷兰等先进工业化国家,这些国家由于缺乏市民社会中民间资本的自发性力量,因此从原始积累开始,国家便扮演了推动资本主义化的主要角色。也由于国家成为推动资本积累的主要机制,政治精英在国家这个场域内的政治行动及论述相较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而言,更具有制度选择的重要性。

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在“全球化”的全体性及同一性概念之下,模糊化了不同历史条件的国家如何进行资本主义化的历程。本研究的目的当然不在于凸显日本作为单一国家的特殊情境与条件,或者刻意去梳理其特殊的历史发展过程,相反地,本研究的目的在于厘清后进发展型国家在资本主义化过程中,针对此一过程衍生的劳资冲突进行何种论述,并通过这些论述如何在不同的典范之间据以进行制度的选择。

劳资关系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衍生出来的主要社会关系,并且在多数国家资本主义化历程中酝酿甚至爆发了激烈的劳资冲突。劳资关

系并非无中生有,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多数劳动力来自农村,农民或主动或被迫转化成为工人。农民与地主的关系如何转型成为劳工与雇主之间的关系,是每个国家资本主义化过程中主要社会关系的转变,牵动着社会结构的变迁,更牵动着政治体制的转型与建构。新的社会关系中谁将获利,谁将被剥削,政治精英如何建立新的政治制度及秩序来实现新的社会关系中对于公平与正义的要求,直接牵动着政治精英能否获得特定属性群众的支持以获取正当性并得到政治权力,进而确保政治体制的稳定与巩固。

尽管当代政治哲学家罗尔斯(John Rawls)曾殚精竭虑发表了正义论,讨论正义此一概念如何可能实现。然而,从法国解构主义者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以降的思想家解析了论述隐涵的权力关系,由 S. 卢克斯(Steve Lukes)加以阐明的便是“谁的利益”由“谁来界定”。当日本的劳工面临劳资冲突,并开始接受不同社会思潮洗礼之际,政治精英忧心的是他们将接受何种关于劳资关系的界定,并据以理解自身的历史与社会处境,并采取集体的政治行动。改革或者革命的集体政治行动,端视劳工如何理解此一社会关系,以及此一社会关系所处的历史脉络。人的社会存在限定了他的社会意识,当工人从其他社会身份转变成工人,并面临新的社会关系所产生的利益与资源分配不均时,其身为工人的意识方才产生,而工人得以用来理解其自身处境的意识形态分歧较大。这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战争,也就是论述的战争。马克思学派的葛兰西早已指出文化霸权的重要性,而阿图塞则称之为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

问题在于文化霸权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不同历史统治集团如何诠释及理解其生产关系,以建构其正当性。如同米歇尔·福柯所指出的,教条马克思主义把阶级结构视为先验的及本质的存在,而忽略了任何权力关系都是在历史中被论述建构而成的。劳资关系的核心问题之一在于利益,而如何界定利益此一概念之内涵,以及与此一生产关系相联结的制度与政体,则是政治精英进行论述斗争的主要议题。

第二节 被迫的现代化

1854年(安政一年),美国远东舰队司令佩里(Commodore Perry)率领军舰,挟船坚炮利,迫使德川幕府结束锁国政策,开放门户,进行贸易,史称“黑船事件”。日本开始感受到迫切的现代化压力,以免沦为列强的殖民地。

在西方列强以及内部诸藩不断交相逼迫之下,1860年代,日本开启了近代第一次政治革命,史称“明治维新”。曾经不断互相争斗的长州藩与萨摩藩组成“萨长联盟”,结合土佐、肥前等雄藩支持倒幕,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及西乡隆盛等维新人士迫使德川幕府将大政奉还明治天皇,并推动废藩置县,使日本的封建体制瓦解,建立中央集权政体。而维新有功的阪垣退助、大隈重信等自由民权论者,则受到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鼓吹召开国会制宪,明治政府遂于1885年(明治十八年)开始正式设置内阁,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1890年(明治二十三年)召开第一届帝国议会。

明治维新的另一个目标是工业化,即发展近代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日本在幕府时代诸藩就开始发展工业,譬如熊本藩的长崎造船厂,明治维新后则加速工业化,通过压低农民与工人的劳动所得与工资,扶持私人资本来进行资本积累,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社会问题日益严重,社会运动勃兴,也屡次受到镇压,直到军国主义抬头并支配了绝对的权力。

第三节 政治精英的“家长制”论述

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便因工业化而衍生劳资冲突,并有不少政治精英以传统的“家长制”来界定劳资关系。政府部门官僚体系、各政党及不同派系均有政治精英采取传统的“家长制”来理解劳资关系并进行制度选择(Kinzley, 1991: pp. 1 - 2, pp. 33 - 39),“家长制”的论述通过制度

化的历程而建立了日本“劳资一体”的“经营家族主义”，延续到二次大战后，成为日本劳资关系的主要模式，迄今仍然是日本式管理的特色之一（Abegglen, 2006: pp. 73 - 85）。

日本的劳资关系被归类为莱茵模式（Rhine model）。相较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Anglo-Saxon model）而言，莱茵模式的论述特征为重视公共利益，强调员工的参与，有别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论述重视短期利益及自由竞争。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如美式企业，其制度论述是一种纯营利的经济体（US company is an economic company），而莱茵模式，如日本企业，其制度论述则是一种共同体（community）（Geus, 1997: pp. 100 - 103）。日本学者也认为日本企业是一个生活共同体（津田真澄，1976: p. 14）。当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衰微之后，有学者认为现今世界的意识形态竞争已经变成为“两种资本主义的战争”（Albert, 1995: pp. 75 - 92）。日本学者则称之为集团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差异（间宏，1989: pp. 287 - 291）。前者属于契约型组织，后者属于所属型组织（三户公，1991: pp. 19 - 36）。

日本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大正民主”时期，由于政党的竞争导致政治上有有限的多元，使得公共政策的辩论与制度的选择出现不同的论述。日本的政治精英除了企图仿效英国的劳动政党或德国的劳动立法等制度选择之外，还提出了所谓的“家长制”论述。部分政治精英，如社会政策学会的金井延及政友会的床次竹二郎等，在以西化为主要制度论述的“现代化”历程中，面对劳资冲突及其制度选择，运用“家长制”的意识形态，去理解并诠释自己的文化传统与社会结构，并与西方国家相比较而加以区别。同时，对于资本主义化所产生的劳资冲突，通过“家长制”的论述进行分析，据此主张采取特定的法律、政策去处理劳资关系，进而形塑建构其劳动体系。

同样面临资本主义化的竞争压力，有别于西方的政治精英对于阶级冲突的理解方式，日本的政治精英除了当时西方主流的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之外，以“家长制”论述来理解劳资关系，并进行制度的选择，儒

家家长制(Confucian Paternalism)^①、和谐社会(Social Harmony)等概念(Bennett & Ishino, 1963; Garon, 1987; Kinzley, 1991)经常出现在政治精英对劳资关系的分析以及劳动政策的争辩中,进而形塑了“终身雇用制”。而追溯“终身雇用制”的制度起源,也确实可以从江户时期的“家”、“村”共同体制度,到幕藩体制的武家制度,乃至商家的经营体制中发现其轨迹,此一社会关系模式是以上下的主从关系来维持长期关系。此时期的终身雇用是一种“主从式的长期关系”,以“亲分”、“子分”的关系维系着上下主从关系。“亲分”对“子分”善尽照顾的义务,而“子分”则需效忠“亲分”,为“亲分”而牺牲奉献(张瑞雄, 2007: pp. 143 - 153)。经营家族主义可以说是将劳资关系视为亲子关系的一种拟制(间宏, 1989: p. 142)。而“亲分”、“子分”的关系则反映了日本社会的基础(有贺喜左卫门, 1959)。

第四节 为何重构“家长制”

历史社会学派将国家体系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两者加以划分,以历史社会学的观点而言,近代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压力与资本主义化是两个不同的逻辑,但近代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压力却脱离不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各帝国主义竞逐殖民地利益所衍生的冲突。如同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在《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一书中所分析,日本作为后进资本主义国家,如同 18 世纪后期的普鲁士及奥地利等东欧国家一样,面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西欧国家先行发展资本主义的竞争压力,因此不得不发展出绝对主义式的政治体系来进行由上而下的“现代化”历程(Anderson, 1974)。因而,资本积累(capital accumulation)这个在马

① 戈登指出,19 世纪以来,随着日本的工业化,管理阶层引用家长制(paternalism)来进行劳动控制与管理,也使得 19 世纪的劳工运动一直受挫。到了 1917 年之后,日俄战争及一次大战后,家长制开始受到劳工运动的挑战(Gordon, 1985: pp. 6 - 7)。